

# 文学与批评中的理性与情感 ——以《文学评论》中的斯威夫特论为中心

庄 焰

**内容提要：**夏目漱石是日本明治时期的代表性文人，他亲身经历了明治日本“文明开化”运动并对其作出了深入的思考。《文学评论》是漱石唯一一部研究18世纪英国作家的批评著作，对包括斯威夫特在内的五位18世纪英国文人及其作品进行了批评研究。在该书第二编中，漱石详细论述了从社会环境出发研究文学作品的观点，然而他在该书第四部分的斯威夫特论中却未能运用这一方法。本文将结合《文学评论》第四编斯威夫特论，探讨漱石自己选定的“社会—文学”这一研究方法因何未能在该论中得到有效运用，以及此后的批评对策。

**关键词：**夏目漱石 《文学评论》 斯威夫特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9)04-0089-1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DOI:**10.16430/j.cnki.fl.2019.04.010

**Title:** Sense and Sensibility in Literary Writings and Criticism—Natsume Sōseki's Review on Jonathan Swift in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Natsume Sōseki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Meiji Japan and a witness of the Japanese modern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movement. *Literary Criticism* is Natsume Sōseki's only critical work on English literature, focusing on fiv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i including Addison and Steele, Jonathan Swift, Alexander Pope and Daniel Defoe. In the second chapter, Sōseki declares that in analyzing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ry works he would refer back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produced them. However, he fails to apply this approach when he tries to criticize Jonathan Swif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why Sōseki's "social-literature" approach is not effectively applied in his Swift criticism.

**Keywords:** Natsume Sōseki, *Literary Criticism*, Jonathan Swift

**Author:** Zhuang Yan, Associate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mail: zhuangyan929@126.com

《文学评论》(1909)是夏目漱石(1867—1916)在《文学论》(1907)之后出版的第二本学术著作,按照漱石的门生小宫丰隆的说法,“《文学评论》原以《18世纪英国文学》为名”(小宫丰隆 384),是漱石从1905年9月到1907年3月这一年半里,以每周三小时的进度在东京帝国大学授课的课堂讲义。后于1909年公开出版之前,漱石“用了约一个月专心于这本讲义,最终校订完成时改写了差不多一半左右”(夏目漱石,『文学評論』5)。这是漱石唯一一部专门研究英国文学的批评专著,全书共有六编。<sup>①</sup>在该书开头部分,漱石表示此书“关注的,并非只是评论这几位作家,而是打算通过评论这几位来表达我在文学上的浅见……”(5)因而《文学评论》的研究者们最关注的问题是漱石究竟表达了何种“文学上的浅见”。鉴于该书只有第一编和第二编谈论了抽象层面的问题,分别就(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社会与文学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两个部分便成为学者们研究漱石思想表达的主要对象。

其中,漱石在第二编中围绕社会与文学之关系做出的种种表述尤为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漱石在这一编里对17世纪末到18世纪英国的哲学(包括神学)、政治、艺术、咖啡馆、娱乐、文学家的地位等进行了描述,勾勒出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化基本状况(思想政治、市民生活以及文化氛围)。此后漱石总结说,英国的18世纪是以科学理性为时代主音的一个乐观向上的时代,并表示“文学是反映当时普遍风气的东西,是当时趣味的结晶之物,与一般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故而应该“把文学当作社会中自然涌现出的一种现象来讲”(56)。人们只要“明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能意会到这样的社会能产生这样的文学”(59)。

由于漱石做出了要用社会环境/时代精神来看文学作品的方法宣告,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学评论》表达的“文学上的浅见”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比如小宫丰隆表示漱石是要通过对几位英国作家的评论来“具体把握时代和生活与作品的相互作用”这个问题(小宫丰隆 384)。然而小宫又(多少有些不太情愿地)表示漱石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成功地完成这一论述任务,认为尽管漱石在《文学评论》的第二编中很好地呈现出18世纪英国注重科学理性的社会面貌,却未能在之后的作家评论中将选定的作品很好地与那个时代的代表性精神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完成社会环境对文学之影响的论述(394)。

仔细研读《文学评论》中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就会发现,当漱石在第四编《斯威夫特与厌世文学》中试图将斯威夫特文学置于乐观而理性的18世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中解读其“讽刺”“厌世”的文学风格时,他遇到了巨大的论述困境并偏离了他在第二编中表达的要用社会环境时代精神来阐释文学作品的论述方式,转而围绕斯威夫特的作品本身展开了讨论。<sup>②</sup>本文将具体考察漱石在解释斯威夫特文学风格时遇到了何种论述困境,以及他在这一困境中又是如何解读斯威夫特文学的。

<sup>①</sup> 第一编《序言》主要论述了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既是《文学评论》一书的方法论也是作者对日本人应该如何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建议。第二编《18世纪的一般状况》全面介绍了18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民风民俗和哲学状况,后四编点评了英国文学家及其作品,分别为《艾迪生和斯梯尔以及常识文学》《斯威夫特与厌世文学》《亚历山大·蒲柏与世称“人工派”诗歌》《丹尼尔·笛福和小说的结构》。

<sup>②</sup> 这种论述方式在另外三编的论述中都得到了运用。

## 一、漱石的“18 世纪观”“古今之争”以及斯威夫特

在《文学评论》第二编《18 世纪的一般状况》中，漱石明确表达了他的 18 世纪观，认为 18 世纪英国是一个“重理性”的时代：他表示从哲学上来说英国 18 世纪是经验主义逐渐取得强势的时代，人们在认识论上越来越远离神学想象、倾向于将一切归于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的思考方式。而这样的哲学动向显示出当时的社会“整体上颇倾向于物质性的世道。是散文式的世道”（『文学評論』72），“英国讨厌神秘的习气，喜爱事实，没有宏伟缥缈的趣味而具有实在恰切的风格。厌恶神秘……喜爱事实既是全体英国人的风气，同时也特别是 18 世纪的特征”（70）。

漱石在《文学评论》第二编中还表示，此前几个世纪里一直作为主流社会风气存在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在 18 世纪里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在“理”性的社会风气中孕育的自然神论(Deism)对以“信”立身的神学进行了全面进攻：“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所谓自然神论的大论争正是这个世纪的事”（65）。“英国的 18 世纪是作为自然神论者的论争舞台而为人所知的世纪。主张自然神论的自然神论者多为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看起来是从霍布斯之流发展起来的唯物论者。可以看作是从道理层面上认为灵魂不灭或未来存在不可相信的人”（77）。他们试图用合乎(科学)道理的方式来解释宗教，“迫切呼吁宗教不能不合乎理性，不要相信神迹和启示”，认为因“现实世界中做不到惩恶扬善这种原始的理想，于是为了平衡就说神会让我们未来永生等等”（78）。漱石认为社会上“发生自然神论的论争这种现象”意味着“人越来越着落在道理上”。在漱石看来，不仅教外的自然神论者、连宗教内部人士都开始用理性来讨论宗教、想把宗教解释得合乎道理：“全体宗教界[都]引入一种风气，即与其以信立身不如以理胜出”（79-80）。可以看出，在漱石的认识中，18 世纪英国的思想主流是崇尚科学合理，甚至连原本更强调情感认同(以“信”为主)的神学领域也开始强调整理性。漱石就是抱着这样全面理性的 18 世纪观，开始了他对 18 世纪英国文学的批评研究。

然而，当代学者中持有不同的 18 世纪观者不在少数，比如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化史权威学者列维尼(Joseph M. Levine)的 18 世纪阐释便使用了“古今之争”的视角，这是一个与全面“理”性的 18 世纪不尽相同的解读立场。所谓“古今之争”，指的是英格兰文化史上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新旧思想大辩论。在这场从 17 世纪末持续到 18 世纪初的论争中，欧洲的知识人分裂为推崇传统的古代派和追求科学理性的现代派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之间就古与今、新与旧、情与理孰优孰劣的问题不断进行着辩论。

与为数众多的认为科学理性已在 18 世纪成为主流的观点不同，列维尼认为这场大论争并未真的决出胜负：“古今之争”自 1690 年开始到“1730 年代才平息下来，被一种表面上的平静所取代。从各方面看来争论都过去了，不过双方谁也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1-2）。列维尼在其著作中详尽描绘了“现代派”的对立面在这场论争里的观点表达，较为系统地以宗教、政治、学问、文学相互关联的综合视角描绘了“古代派”的立场，用一种并不忽略古代派言论的视角呈现出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复杂多样的 18 世纪。

除了宗教领域的“古今之争”以外，学问领域也发生了新旧理念的斗争，这一论争涉及

文明走向的问题,科学思维方式的普及带来了对事物新的认识方式,使人们开始思考“古典”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古典是应该继续全方位占据霸主的地位,还是也有可能被新的(科学理性的)认知模式所超越?古代派和现代派在学问领域的主要分歧,是在如何认识知识这个问题上:

所谓“古代派”和“现代派”,不是简单指老作家和新作家,也不是指喜欢这种或另一种的人,最关键的是指推崇两种知识理念的两个派别。……对他们[古代派]来说,历史的目的在于找回过去的事实,而在于通过修辞和道德榜样使读者获得提升。“古代派”都是通才,他们强调学问和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他们坚称,政治家应受文学教育以使他们能公正地管理。学问的正当目标在于一种善而道德的生活,而对古典作家的学习最能达成这一目标。

相比之下,“现代派”则把知识看作不断深入地把握经验这种进程的构成部分。因为对新科学不久之前的伟大成就印象深刻,大多数现代派假定人文在其他学问领域也能进步……现代派大都与所谓古代派一样熟谙古典领域,但他们倾向于用科学家而非道德家的眼光看待过去。他们认为自己能比先辈知晓更多,因为他们有优势、可以从以往的著作开始其建树……[而]坦普尔……相信,在古希腊罗马的作品中,人类已经对道德和统治方式达到了可能达成的最高理解,这是学问之终极价值。(Mueller 203-04)

对于“古代派”来说,学问是提高修养的手段,古典文学的修习最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口才和品味),而提高修养是为了获得优秀的判断力、成为合格的政治家,也就是说,“古代派”认为“文学—学问—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与之相较,“现代派”则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觉得所谓学问/知识,应该是在更加科学的方法的帮助下更好地理解事物。出于这一观点差异,新旧两派在学问领域的理念之争不可避免。

对于宗教界的新旧两派的论争,若从列维尼那种更重视古代派的视角来看,则宗教界内部并未(如漱石认为的那样)全体转向了理性,而是分成了崇今派和崇古派两个阵营。其中,“崇今派”(in favor of the Modern)的新派教士主张宗教应适应外部社会的变化,应将理性打造为基督教新的支撑力量以助宗教适应新时代,他们试图用现代学问和方法来反驳自然神论者对宗教的攻击。而斯威夫特作为坚守传统神学的“崇古派”教士,则认为新派教士试图“使用‘可见之事’去确证‘上帝的不可见之事’的言论……将‘自然神学’或‘理性宗教’作为批判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武器”(时霄 141-42)并非明智之举。

斯蒂芬(Leslie Stephen, 1832—1904)认为,包括斯威夫特和约翰逊博士在内的18世纪文人们普遍反对自然神论对宗教的威胁,是因为这些文人们大都对之前一个世纪克伦威尔执政前后的社会动荡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争斗记忆犹新,这令他们变得尤为谨慎,“对危险后果的隐忧……让智识之士们……完全拒绝深入讨论”(History 369)可能会动摇宗教根基(从而导致社会混乱)的那些针对神学的“理性”质疑。在斯蒂芬看来,英国“国内的常识全都在天启一边,反对自然神论,而这些最富才华的作家不过是常识的传声筒而已”(369-70)。尽管斯蒂芬表示社会常识仍是相信天启,但他同时又表示“神学已经大部

分都像自然神论那样自然神论化了”(370)。也就是说,他觉得宗教界内部已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理性化了。漱石在《文学评论》中论及“自然神论之争”以及宗教界内部对于自然神论者的回应时表达了和斯蒂芬一样的观点,都认为在18世纪英国宗教界内部“理性”也获得了胜利。

对于文化和学问领域的新旧理念争斗,斯蒂芬也做出了现代理性全面胜利的判断,表示“讨论之热切是那时所特有的,现代精神在那个时候已经胜利地背叛了古代的经典品味和哲学”(Swift 33)。尽管斯蒂芬并没有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呈现“古代派”的立场,且对于斯威夫特在文化领域的“古今之争”中的立场也只是简单地表示“斯威夫特只是局部参与了一场小争论,在此无需多言”(33),但他显然提到了文化领域的“古今之争”以及论争中的斯威夫特。值得注意的是,漱石在《文学评论》中只讨论了英国18世纪宗教领域的新旧理念争执(“古今之争”的宗教战场),对文化和学问领域的“古今之争”却只字未提,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将斯蒂芬著作列为《文学评论》主要参考书之一的漱石,不太可能漏读斯蒂芬书中关于学问领域“古今之争”的段落。那么他在《文学评论》中略去文化和学问领域的新旧理念之争的写法,或有别的参考范本。阅读漱石的斯威夫特论不难发现,其总体写作模式及论中所选作为斯威夫特气质特征之佐证的具体例证,与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的《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中的斯威夫特论(第三部第四章)十分接近。从两个斯威夫特论中的事例选取以及对作家文风寻求解释的方式来看,很难说漱石完全没有参考过丹纳的斯威夫特论。漱石藏书里有两套丹纳著《英国文学史》(英译本,漱石藏有一套四卷本,一套合订本,其中合订本的书中眉批和重点划线),还藏有丹纳的《英格兰笔记》(英译本, *Notes on England*, 也做了眉批、划了重点线)。也就是说,漱石至少阅读过英译合订本《英国文学史》。此外,《文学评论》行文中虽未明确表示引用了丹纳的《英国文学史》英译本原文,但漱石在该书的笛福论中转引他人的评论称丹纳虽“是个法国人,却比英国人还通晓英国文学”(『文学評論』444)。基于此,两人的斯威夫特论并非完全没有对照研究的价值。

丹纳的斯威夫特论是一个充满斯威夫特生命细节的琐碎的个人史,描绘了斯威夫特因为人格高傲、渴望权力却终生受辱、悲惨不堪最终变成疯子的人生史,并以此来解释其(所谓的)厌世、厌恶人类以及嘲讽一切的文学风格。该论引用了大量斯威夫特的书信内容(为展现其古怪狂暴的性格缺陷)和他的政治评论(以呈现他好斗、冷酷嘲讽的文风),具体分析了《木桶的故事》(以显示他讥讽一切的态度),还引用了一些《格列佛游记》(用来表示他厌恶人类)。最终丹纳表示,斯威夫特创造了一种无情打趣的文风,而其他不幸伟人的文中的呼喊或愤怒与他平静的行文之感染力比起来微不足道,因而他是古典时代最伟大的。由此,丹纳从斯威夫特文学作品的惊人效果出发肯定了他的价值(*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98-256)。然而,这篇斯威夫特论的行文方式彻底背离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的“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00)这一理论脉络,文中不但对斯威夫特与时代氛围的关系未加丝毫分析,也没有对他的重要作品《书籍之战》《木桶的故事》《格列佛游记》之成因进行任何与外部历史环境有关的论述。

漱石是否因为参照了丹纳的斯威夫特论而忽略了对文化领域“古今之争”以及“古代

派”立场的描述,这一点无法确证,但无论如何,按照丹纳的论述模式,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富有才华但疯狂暴怒而无理的疯汉,而不可能对斯威夫特在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持有的文化立场有所省察。然而,若是站在列维尼所持的那种更重视“古代派”立场的视角、将“古今之争”中“古代派”的言论主张引入斯威夫特研究便不难看出,他恰恰是站在古代派阵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是一个站在科学理性的时代大潮对立面的宗教人士和文人,他的文学因而也不可能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科学理性)形成一致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漱石若想按照他在第二编中表述的研究方法、从科学理性的时代主音出发来分析(处于时代精神对立面的)斯威夫特的文学,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 二、《文学评论》中斯威夫特论的写作困境与论述策略的转变

阅读《文学评论》的斯威夫特论可以看出漱石在这一编中确实陷入了论述困境,当他试图将斯威夫特“厌世”“讽刺”的文学风格与时代相结合进行阐释时,他感到无从下手。漱石为难地表示:“感觉他[斯威夫特]无论如何也不是18世纪风格的。他的声音是绝望之声,具有不允许世上存在任何光明的不满足。无论如何也无法看作[因发现科学理性而乐观向上的]时代思潮的表现”(『文学評論』241)。这个困境致使漱石放弃了在其他部分里用得颇为顺手的“时代主流风潮—文学”的研究方法,转而寻求其他的可能性。

他首先想到从斯威夫特的个人经历方面寻找原因:“若是认定其表现的不是时代思潮,无疑只好到个人的人格方面去寻找出处,再就是要寻到他个人独特的人生经验上,除此以外无路可走。要看看他的私生活不愉快到何种程度,再就是他的公众生涯以什么程度的失败告终,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时候就有必要参考他的一般传记”(241)。然而“通读斯威夫特的传记一看,令人吃惊地格外缺少起伏。就算从外在的历史来看他多少有些失意,但事实上他的人生波澜显然并不足以解释其伐鞑全人类的表现”(242)。这条路径行不通,漱石又转向了内在世界:“得探究他[斯威夫特]内在的历史。再进一步说还要探究他遗传的倾向。可是这两方面都是执行起来颇为困难的事。我内心的历史是除我以外无人能知的,而且多有我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地方。更何况斯威夫特内心的历史……”(242)最后,漱石详细列举了多种有可能导致斯威夫特“伐鞑全人类”的原因:身为遗腹子的孤儿身份、早年缺乏亲情的人生经历、正直的人格、身体疾病、与女性的关系以及政治生涯的经历等等(243-53)。最终总结说,尽管上述各项未必会导致“厌世”,但为了解释其“厌世”的文学总要找些原因,既然斯威夫特的“厌世”倾向并非“与18世纪一般的思潮相伴之物……并非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那就]只能试着看成是来自其人的人格和个体的经验”(255)。在列举的几种原因中,漱石认为“最有力的一条是他肉体上的疾病”(255)。到这里,漱石草草终结了他对斯威夫特文学风格之成因的探索。尽管漱石(与丹纳一样)也对斯威夫特的个人史和性格进行了探索,但他并未像丹纳那般言之凿凿地用个人化的理由来解释斯威夫特的文风,而是提供了一些温和的猜测之后就此打住,转而(结合自己当时最关切的问题)紧密围绕《木桶的故事》和《格列佛游记》展开了分析论述。

漱石的论述困境发生在他想把斯威夫特的“厌世”文学置于乐观向上的理性的18世纪中加以探讨的时候,他的这种尝试恰好遇上他所理解的18世纪主流思想(科学理性)与

“古今之争”视野里“古代派”的斯威夫特之不可调和之处。可以说，漱石在论述斯威夫特时遇到困境，是由他持有的乐观向上全面“理”性的18世纪观与“古今之争”的18世纪观之差所造成的。

漱石与他多次引用的斯蒂芬一样，认为斯威夫特是“厌世”且“厌恶人类”的，不过他没有采用丹纳的斯威夫特论中那种从个人性格来解释文学风格的方式，而是恪守用社会环境来解释文艺作品的方法、十分诚实地表示从时代环境来看斯威夫特的“厌世”显得十分难解：18世纪的英国不论是“在社会制度上、还是在政治组织上都是让英国人自认伟大光明的时代。如此看来，这里有斯威夫特这么一个人，向人类和社会抛出非常黑暗的观点，与时代关联起来看的话，不得不说是脱离常规的现象”（『文学評論』240）。

漱石无法解释在这样一个“光明”的时代里为何会有斯威夫特这样一个“厌世”的文人，他表示：

这个现象有点不可思议。这种非常冷静且猛烈至极的对一般人类的嫌恶，在任何时代什么时候都不常见。不管生在多么运道衰落的世道，不管怎么受尽屈辱的人，都不太容易变成这样。特别是在18世纪就更是奇妙……英国的18世纪决不是一个会兴起厌世倾向的时代。作为1688年革命的结果，18世纪的英国人确立了议会政治。他们将其命名为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为实现了自由而欣喜，自信没有可以与我匹敌的政体。且他们生在理性的世道里，凡事都诉诸理性来解决，而且也认为这样完全得当。他们的开化是前途有望的开化，在开化有望的国民中不会有厌世的音调。他们看看过去，呼之为野蛮时代。不留恋过去的国民没有悲哀的声音，也不出慕古的文学。（239）

不过若采用更重视古代派斗争观点的视野就不难看出，斯威夫特恰恰是站在“古代派”立场上的慕古文人（尽管众多斯威夫特研究显示他并不真正反对理性或科学，而只是从保有社会道德秩序的角度出发选择了自己的“古典的”文化和宗教立场），他重视传统神学观念和古典文学在道德方面对于社会和人的作用，拒绝接受现代派的宗教主张和政治理念。他对传统神学和古典文学（文化）的重视，不仅关乎人的素养（宗教的文学的）也直接关系到政治生态（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慕古”的斯威夫特之“厌世”极力讽刺“现代”之种种，其作品里猛烈尖锐的攻击，表达的是“作者对[古典的]真理和善的坚定信仰以及对其遭受挑战的愤怒”（Mueller 202）。这自然不可能与“时代主流”（科学合理）契合、形成一种同向关系，因而“从社会方面讨论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斯威夫特论这个环节才会难以进行。

从“古今之争”的视角切入斯威夫特，则会发现其文学中围绕宗教和学术所做的“讽刺”或“厌世”风格的表达并不那么难以理解。对于“古今之争”视野中的斯威夫特来说，不论是宗教还是学术方面的论争都不仅仅是关于（科学式的）求真辨伪的斗争，而是关于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在宗教方面，斯威夫特反对崇尚理性的宗教解释模式，如前所述这是因为他认为对宗教进行理性解读将动摇宗教的信仰根基而终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另一方面，作为文人的斯威夫特认为现代派“求真辨伪”的写作方式是十分糟糕的，他认为好的文

学应该是简单易懂的,而现代写作则充斥了注释、引用、考据等知识性的部分。在斯威夫特和其他古代派人士看来,这类“低劣的写作会削弱文明”(Mueller 208)。

在不少斯威夫特研究家看来,《书籍之战》《木桶的故事》这些包含了大量注释、页边注、长篇累牍地引用和偏离话题的作品是对他眼中低劣的现代写作的戏仿。比如斯蒂芬认为《书籍之战》表达了“对学究的轻视”(Swift 34),穆勒(Judith C. Mueller)认为《书籍之战》混杂有“叙事诗、动物寓言、哲学和政治论文、历史”等多种文类,这种看起来几乎失控的混搭“一直被当作是对低劣现代写作的模仿”(205-06)。如今的斯威夫特研究专家们普遍认为,他是试图用这种形式上混杂拙劣的文体反衬出古典修辞和文体的优越。然而,尽管斯威夫特研究专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书籍之战》……是一个喧嚣滑稽简单易懂的荒谬戏仿,或可算是散文中最了不起的戏仿叙事之作”(Eddy i)。但他们还是担心,因为“一个人长篇累牍地模仿蠢货,很难不冒被人视为无聊愚人的风险”(ii)。

作为一个并非早期英格兰文化史专家的普通外国文学研究者,漱石在试图使用“社会—文学”的研究方法解读斯威夫特文学时遇到了困境,这一困境直接导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即外国读者应如何理解斯威夫特文学,而漱石在斯威夫特论后半段的分析操作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 三、《木桶的故事》的讽刺风格,以及何为好的文学写作

《木桶的故事》在“1704年匿名出版”(Mueller 206),出版后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该作被公推为才华出众的讽刺名作,在斯威夫特的早期作品中“该作达到顶尖”(Stephen, Swift 36)水平。这本书“在一七零四年至一七一零年间,共出了五版”(主万 2),广受欢迎。在1710年该书第五版发行时新添加进来的《作者的辩解》中,斯威夫特表示该作是要对宗教和学术方面的弊端进行讽刺,因为“宗教和学术方面的许许多多重大弊端可以为他提供素材,写一篇有益而且有趣的讽刺作品”(5)。他表示“宗教方面的弊端,他计划在《外衣和三兄弟》这篇寓言中予以阐明,而这一寓言则将构成这篇文章的主体。至于学术方面的弊端,他决定通过一些离开本题的文字提出来”(5)。

漱石对《木桶的故事》的解读聚焦于《外衣和三兄弟》这篇寓言,就是斯威夫特所说的涉及宗教弊端的那个部分。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漱石先将斯威夫特的讽刺风格与其他作家进行了比较,表示文学上表达不满有几种方式,比如狄更斯是正面表达人物的丑恶(正面的憎恶),艾迪生是侧面发出礼貌的冷嘲、感叹世风日下(侧面的憎恶),晚些时候出现的爱略特是同情性地表达人类缺陷(『文学评论』236-37)。在漱石看来,前述作家表达的不满大体上可以视为“乐观的不满”,即在表达不满的同时心中总有一丝满意之处、或至少会抱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未来之梦想(『文学评论』238)。而斯威夫特则完全不同:

他抱有的,是从过去到现在至未来、穷尽古今东西,只要是人类都是讨嫌的动物这种不满。故而没有希望,无可救赎,不得赦免。他的讽刺就像是喷火口迸发出来的冰那样的东西,异常猛烈,又格外冷峻……斯威夫特为不平而发不平,因此自己毫不激动,冷静如常。斯威夫特的心情就像是一块很重的大石在英国正中滚动一般。这

样,有此一石,不用说前后左右,感觉全世界里蠢动的那种叫做人的东西都变成了石头。要说缘由,他无论怎样吐露憎恶之意也不面红耳赤,也不表露出恭敬,而同情是原本就没有的。他不把一切放在眼里,没有人情味,也不含乐观的成分。他自己是一块顽石,也把其他人看作滚动的大石。就这样冰块一样不断冒着寒气。(『文学評論』238-39)

至于为什么斯威夫特在几乎所有著作中都表现出这种讽刺文风,如前所述漱石在检视了各种原因而不得要领之后表示,斯威夫特从不进行正面表达而一贯采用反讽的姿态是其天性所致:“斯威夫特是这样一个人,不论看世界、还是看人、看这个人也好看那个人也罢,都是讽刺地去看。他的讽刺不是一时的态度,而是贯穿他一生牢固不可拔除的天性……什么时候都是用同一种不变化的态度来看待事物。不论何时都持不满足的消极态度,且其总是从反面表现出来,决不从正面发出。他除了这种态度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文学評論』256-57)。

斯蒂芬表达了与漱石的“天性论”十分相似的看法,认为斯威夫特的讽刺没有特别的理论上的根基,只要是“非我”的便会进行讽刺性攻击:“斯威夫特从未费力为其[表达的]信条寻找任何哲学根基……他坚守着自己教会的信条,这并不是因为他能为自己的信仰找出抽象的理由,而是这个教会碰巧是他所属的。他在其他方面的主张皆如此,政治上还有神学上的,都是爱之如爱其友,不过是由于他们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Swift 45)。可以看出,在倾向于认为18世纪是“理性”全面占优时代的批评家那里,斯威夫特呈现出一种天性爱讽刺,或是因爱自己而乐于攻击异己的形象。

与此相对,那些给予“古代派”立场更多关注的批评家们则倾向于认为斯威夫特的讽刺实际上是策略性的选择。讽刺并非斯威夫特所独有,而是17、18世纪许多作家(特别是现代派文人)共享的风格:“如果说17世纪是剧作家和神学家们的伟大时代,那么18世纪就是一个批评家、散文家、讽刺家、小说家和道德家们首次显现、或达到巅峰的时代……批评……在艾迪生手上首次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讽刺在前一个世纪已有实践,且在德莱顿手中成了一件可怕的政治武器”(Taine 367)。17世纪的古今之争中现代派文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辛辣的讽刺笔法嘲笑古传德性——这一写作风格在18世纪的启蒙文人那里得到发扬光大”(刘小枫 125)。而斯威夫特的讽刺有别于现代派文人的地方在于,这是他们对那些劣质的“现代”写作的戏仿,而其水准和强度甚至超过了他们。

穆勒认为像《木桶的故事》这样的夸张的讽刺性戏仿,或可看作是斯威夫特在当时新兴的出版大潮中向民众发出的警示,是斯威夫特担心劣质书籍对读者的破坏性才做了讽刺性戏仿以图“唤醒读者的洞察力。用过度的文本装置,冗长的前缀序文,以及硕大的脚注……来瓦解书籍的神秘性……令我们质疑其权威、意识到其危险”(Mueller 208)。

阅读《木桶的故事》不难发现其结构混乱零散,在故事主体(《外衣和三兄弟》)开始之前,先罗列了一大堆题外的小文,比如《补充说明》《致约翰·索默斯勋爵阁下》《书商致读者书》《奉献书——致后代王子殿下》等,而在故事主体开始之后又不断离开本题进行漫无边际的叙述,故事主体部分一半以上的内容以“离开本题”冠名,“最终故事主体彻底

消融,文本以叙述者决心‘言之无物’这一结论收场”(Mueller 206)。穆勒表示,这样的戏仿“从本质上来讲是不稳固且具有破坏性的。《木桶的故事》模仿了那些令斯威夫特觉得反感的写作,[同时]也令该作处于被人讨厌的危险中”,“斯威夫特总是不信任读者的能力,而他的作品恰恰对此要求很高”(208)。比如,读到三兄弟这个故事主体部分时,“斯威夫特的读者必须识别出宗教讽喻这一表达方式”(208),否则便难以领会故事的意图,而这对不熟悉基督教历史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无独有偶,漱石在早于穆勒一个世纪左右之前评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从质疑基督教历史的讽喻性表达能否普遍有效地引发普通文学读者的兴趣这一角度出发的。在开始作品分析之前,漱石首先大体介绍了故事主体:父亲去世前给彼得、杰克和马丁三兄弟留下一件外衣,告诉他们外衣会随着主人身体改变长短大小,所以永远合身,并留下遗嘱告诉他们如何保护好外衣,但三兄弟都按自己的需要对外衣做了改动,等等。漱石接下来表示:“按评论家的说法,这是讽喻。要表达的是父亲留下来的上衣是基督教的信仰与教理之衣,且凭着父神的智慧、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和场合。三兄弟中,大哥彼得代表天主教(Popery),马丁代表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而杰克代表不从国教者(Protestant Dissenters)。如此,《木桶的故事》这个作品就是一个长长的讽喻,即把教会的历史变成了个人的历史”(『文学評論』260-61)。这个故事里“如今拿彼得这么一个人来代表天主教、用马丁来代表英国国教、用杰克来代表其他的不从国教者……这无疑属于专断的比较。当然彼得与圣彼得(St. Peter)同名,马丁是路德(Luther),而杰克是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名字没有错,但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可以让人在智力或感情方面想象出原物的线索”(『文学評論』262)。

所谓专断的比较,是指被比较(比喻)的双方“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没有相似之处。就是要你按照他制定的方式用这个事物代表那个事物。比如用人代表时间、用女人代表日本这种,正如代数用a代表10,用b来代表20一样。这仅仅是一种约定,两者之间在感觉上并不怎么相似,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是任意地决定罢了”(『文学評論』262)。

在漱石看来,这种基于基督教历史所做的任意而专断的比喻方式对知识的要求很高,对于不了解基督教历史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我们读《木桶的故事》时必须先听[注释家们研究思考后作出的]说明,预先了解这三个人物各代表什么……从知识上明白彼得的勾当都是天主教的做法,马丁就是一部英国国教的历史,而杰克则代表不从国教者……要想理解这个讽刺寓言,我们不能不预先知道教会的历史。那种受过读史教育的人,多半非得了解一下教会通史,不过这并非人们必须要知道的知识。受过教育或者对文学感兴趣而不知宗教史的人都有可能存在。可是若没有宗教史的知识,此书的讽喻就几乎没有意义,从知识上也难以理解到底在说什么。因此能欣赏这本书的读者就有了条件限定,需是众人当中懂得宗教史或是对此有兴趣者。因而此书自己限制了其所面向的读者范围。(『文学評論』263-64)

漱石在《文学论》以及其他作品中曾经反复强调，文学应以感情为主脑，好的文学应是一种依靠感情上的联想直接唤起情感共鸣的作品，而那些在情感上不能打动人的东西根本不具有成为文学材料的资格：“在社会百态的F[意识焦点]中，只要能让我们附加上f（情绪）的，就应该采纳为文学内容，相反时则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驱逐出文学领域”（『文学論』104）。漱石认为，内容越是具体就越能唤起人们的情绪，也就越适合作为文学的内容，具体的成分减少到一定程度就不再能引起人们特别的兴趣了，而知识性的内容“大都是不伴随强烈情绪的”（115）。比如“康德的论文，比如黑格尔的哲学讲义，或者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这些哲学家科学家的论文“其内容本身与情绪完全无涉”，因此阅读时“兴味明显减少，正如微风吹过水面激起片刻涟漪，不过能换来读者微微一笑而已”（110）。

若以这一标准来“判断《木桶的故事》中讽喻的文学价值，可以认为它只有理智上的价值而没有感情上的价值”（『文学評論』263）。阅读这样的文本，读者不但要有相关的知识储备，还要锲而不舍深入地挖掘才能得到微弱的阅读乐趣。在漱石的理念里，这样的文学算不上好的文学。

有意思的是，穆勒认为斯威夫特创作《木桶的故事》这种唬人的文本，其意正是要展示“现代派”那种学究式穷理求真铺陈知识的写作有多么讨人厌烦，顺便再讽刺一下这种骇人的新式写作试图传遍全人类的野心。穆勒分析道：

斯威夫特的叙述者……在他的妄念中，期待人们对其“神圣的专著”发出普遍的赞许，他认为[此作]将被翻译成全球各种语言以“惠及全人类”……

叙述者抱怨说“当今读者有一种肤浅的倾向”阻碍了他写的这种优秀现代作品为人所接受。他悲叹说读者们“无论如何不肯听从透过表面和外层检视事物的劝说”……叙述者暗示说读者应该“挖掘”现代文本的“智慧”……[然而]好的文本——一目了然的文本——不需要挖掘。这么说的话，《木桶的故事》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文本。作为一个戏仿劣质写作的作品，《木桶的故事》的拙劣在讽刺意味上确实意义非凡。令《木桶的故事》真正不朽的，十分荒谬地仰仗于[该作自身]具有斯威夫特所讥讽的特质。（211）

按照穆勒对斯威夫特的分析来看，漱石与斯威夫特在何谓优秀写作这个问题上倒颇有见地相同之处。尽管斯威夫特文本中（为效仿他厌恶的写作而设置的）大量的讽刺以及解读其作所需的知识储备阻碍了后世日本读者/学者的解读，令漱石未能更加有效地对斯威夫特文学做出令他自己满意的阐释，但他在阅读斯威夫特讽刺风格时透露出来的对于好的文学的理解，却暗暗呼应了斯威夫特本人的主张。

#### 四、个人的趣味，以及批评的冒险

审视漱石对《木桶的故事》的分析可以发现，当现成的“社会—文学”方法行不通时，他并没有采用丹纳那种用个人性格解读文学风格的方式将这一话题进行到底，而是放弃了这

个战场,另起炉灶用他自己“重情轻理”的文学观念对具体作品展开了批评式的解读,表达了他对文学中的理性与情感这一问题的看法。而他的这种操作实践,为日本学者给出了一个进行外国文学批评操作的样本。

在《文学评论》第一编中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时漱石表示,日本学者鉴赏外国文学文艺作品时应该从自身所具备的情感和趣味出发(而且是自己目前的好恶),然后进行科学的分析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称这种态度为批评性鉴赏的态度(critical appreciative)。他在外国文学研究方法里专门提出“个人的趣味”这一要素,是因为他发现当时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唯西方观点是从(认为西方的就是普遍的),缺少自己的声音,他批评说“现今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冥冥之中认为所有一切趣味都是普遍的”,但他认为“他们的这种认识是不合理的”(『文学評論』48),应以自己的趣味为评价标准。

漱石分析说日本学者经常跟从西方学者的观点,可能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就是日本学者研究外国文学时有一个障碍,担心自己无法体会外语文学的微妙之处,出于对外语的不自信而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幼稚的,进而选择全盘相信西方人的观点。对此,漱石认为即便是英国人对其自身的语言也不一定能够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他们批评作品未必比日本人更有优势,因此无需因为语言问题而一味膜拜外国评论家的观点。他还列举了西方批评家的日本文学史写作案例,表示:

阿斯顿<sup>①</sup>(Aston)写《日本文学史》,张伯伦<sup>②</sup>(Chamberlain)评日本文章,都是从英国人的见地出发做出了有效的批评。语言虽然不同,但内容是文学的。只要着眼点是文学,只要以趣味来进行判断,就没有扔掉自己的趣味标准而服从他人之说的作法。一旦服从就失去了自己的趣味,少了趣味,不用说外国文学,连批评本国文学的资格也没有了。(『文学評論』49)

他指出,不同时代的外国评论家都会对同样的作品有不同的分析,因而日本的评论家只需拿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批评即可,不必盲从外国批评家的观点。他甚至表示,就算会有研究者滥用“个人的趣味”,不去熟读、品鉴作品就胡乱批评,在当时日本也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冒险使用此法(『文学評論』50)。

从这个角度来看,漱石在斯威夫特论中是否“正确”评价了斯威夫特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他用自己“重情轻理”的(个人化的)文学趣味作为标准进行了外国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这一行为本身,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一个要点。如此,漱石的斯威夫特论不仅因其是日本的第一个斯威夫特研究而具有重要意义,也因该论中表达的他个人的“重情轻理”的趣味标准或可视为漱石的另一个“文学之浅见”而具有重要意义。□

<sup>①</sup> 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 1841—1911),英国外交官,日本问题学者,著有《日本文法》《日本文学史》《神道论》。

<sup>②</sup> 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英国语言学者,1873年来日,在东京大学文学院讲授语言学,著有《日本语文法》《日本事情》,对于向海外介绍日本贡献很大。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Eddy, William Alfred. Introduction. *Gulliver's Travels, A Tale of a Tub, Battle of the Books*. By Jonathan Swift. Ed. William Alfred Eddy. New York: Oxford UP, 1933. i-iii.
- Levine, Joseph M.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 New York: Cornell UP, 1994.
- Mueller, Judith C. "A Tale of a Tub and Early Pros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 Ed. Christopher Fox.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3. 202-15.
- Stephen, Leslie.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2.
- . *Swift*.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1.
- Taine, H.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3. Trans. H. Van Lau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06.
- 小宮豊隆:『漱石の芸術』。東京:岩波書店, 1976。
-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九卷『文学論』。東京:岩波書店, 1966。
-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卷『文学評論』。東京:岩波書店, 1966。
-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1。 [Taine, Hippolyte Adolphe. *The Philosophy of Art*. Trans. Fu Lei.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1991.]
- 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6。 [Liu, Xiaofeng. *Classical Studies and 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Beijing: Huaxia, 2016.]
- 时霄:《英格兰“古今之争”的宗教维度与斯威夫特的〈木桶的故事〉》,载《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136-53页。 [Shi, Xiao. "'New Science' and Religious Certainty: Jonathan Swift's *A Tale of a Tub* and the Ancient-Modern Controversy in Engl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17): 136-53.]
- 斯威夫特:《木桶的故事 格列佛游记》,主万、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Swift, Jonathan. *A Tale of a Tub, Gulliver's Travels*. Trans. Zhu Wan and Zhang J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2000.]
- 主万:《前言》,载斯威夫特著《木桶的故事 格列佛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1-6页。 [Zhu, Wan. Introduction. *A Tale of a Tub, Gulliver's Travels*. By Jonathan Swift.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2000. 1-6.]

责任编辑:马海良